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专著《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

07_爱的链接：婚前性行为全貌

作者: 潘绥铭 等 来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3月 类别: 专著《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 日期: 2005.08.10
今日/总浏览: 1/2296

爱的链接：婚前性行为全貌

在社会上和传媒上,最近20年来被用得最滥、最含糊的概念之一,就是所谓“婚前性行为”了。许多人用它专指青少年的性行为;有些人是专指偶发的性行为(类似“一夜情”);还有人则是专指与恋爱对象之外的性行为。

其实,所谓“婚前性行为”至少可以从3个维度上来看:发生的时期、发生的对象和性关系的性质。

在时期维度上,“婚前性行为”至少包括3种情况:

- 1) 从来没有结婚的人所发生的性关系;
- 2) 已婚者(包括再婚者)在正式登记之前的性关系;
- 3) 已经离婚或者丧偶的人,在下一婚姻之前所发生的性关系。

在对象维度上,婚前性行为应该包括:

- 1) 与后来真的结婚了的人的性关系;
- 2) 有了性行为之后一直没有结婚;
- 3) 性交易行为,例如嫖娼卖淫。

在性关系的性质这个维度上,婚前性行为则需要区分:

- 1) 偶然的性行为,例如“一夜情”;
- 2) 时段的性行为,也就是多少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性关系;
- 3) 非婚同居,指的是与婚姻类似的持续的共同生活的性关系。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判定或者指称任何一个具体的性行为的时候,就不应该再笼统地称之为“婚前性行为”了,而是必须对上述3个维度的9种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才能逐渐发展出符合事实的一系列准确的称谓来,例如“离婚者不结婚的时段内的性关系”等等。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里，并没有专门设置的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提问。我们是通过对于性行为的发生年头、结婚年龄、发生首次性行为时双方的关系等一系列变量，进行相关统计，才最终确认那些确实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样本，而且生成相应的派生变量。

在下面的统计分析中，笔者所说的“婚前性行为”将涵盖上述的全部9种情况。只不过在这里暂时不论述婚前所发生的性交易行为，而是在本书的后面再专门分析它。这样，本文所使用的“婚前性行为”的定义就是：

发生在任何一种正式登记的结婚之前的性行为，无论当事人是否有婚姻史，无论产生什么结果，无论双方关系是什么性质，无论持续时间长短。

婚前性行为的概况

绝大多数中国青少年，包括男性和女性，都是处男或处女。我们的数据表明，只有8%的被调查者承认他们曾在二十岁之前发生过性行为。男性和女性第一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5岁和23岁。

即使是那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或者更晚才达到15岁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第一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仍然保持在23岁。这一结果与在美国观察到的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男性和女性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分别是17岁、18岁（NHSLs Data）。

在中国，就像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城市里的年轻男女开始性生活的时间，要比农村青年人晚一些。但是这个差异并不能表明农村青年在性方面更加积极。实际上，这是由于中国农村里仍然盛行早婚。

在构成中国性革命的诸多方面，婚前性行为是最引人注目的。[\[1\]](#)

我们的数据表明了这方面的3个明显趋势。

首先，在婚前性行为中，男性比女性更富有冒险性。与女性相比，在任何一个年龄组中，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在进化心理学看来，这只是“雄性进攻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男女性道德的双重标准”所造成的。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婚前性行为都在剧增。

第三，在城市青年中，婚前性行为的增长超过农村青年。这是因：在城市的环境中，社会对于婚前性行为控制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其中，“性交易”占了相当的比例，而这在农村几乎是不存在的。

但是，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统计标准，当今中国青年的婚前性行为比例，都远远低于美国的同龄人。在美国，在1963年到1974年之间出生的人里（1999年我们开始调查的时候应该是26—35岁），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是65.7%；女性则是64.0%。

这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青年中的“性革命”还刚刚开始。

其次，与男性相比，中国女性，即使是年轻的女性，仍然对婚前性行为退避三舍。就这一点而言，男女平等还远没有实现，性革命的真谛——女性的性革命还没有到来。

仍然在残害女性的“贞操”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80年了，可是仍然有一些青年无法实践它的理想：不是用处女膜的完好，而是用爱情的真挚，来判断女性的“贞操”。结果，当信奉爱情高于一切的青年生活在欢乐与幸福之中时，那些自己给自己绑上十字架的男女却痛不欲生。女性尤甚。

最常见的有三种情况：1、所谓“失贞”的女性产生了严重的自责，无法解脱；2、这样的女性只好“破罐子破摔”，嫁给那个男人；3、如果那个男人“始乱终弃”，女性则不敢重新选择。

凡是认为自己已经“失贞”的未婚女性，都是由于男方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强制，自己则是很勉强的。那么这些女性完全不必自怨自艾。因为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女性为什么没有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而在于：男性为什么非要“强攻”不可。

在“五四”主张男女平等近8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提倡个人独立性近20年以后，如果一个男性仍然不能明白：爱情的第一要素是双方的平等与互相尊重，仍然抱着“不干白不干”或者“先捞一把再说”的态度，那么责任究竟在谁呢？女性为什么不厌弃他，甚至痛恨他呢？为什么非要把责任拉到自己头上呢？

那个男人的坏，并不是你的责任；他坏，只能说明你好；如果你也认为自己坏，或者变坏了，那就上了他的当了！

一些女性认为，所谓“失贞”就意味着自己不得不“嫁鸡随鸡”。其实，这样的男性，只不过是这个时代时代的弃儿，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被强制的女性，干吗不多为自己今后的幸福想想？尤其是，你以为这样的男性就会和你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双方的爱情吗？恐怕不会。你难道准备容忍他今后再去别人那里“强攻”或者“偷嘴”吗？

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还有谁会娶一个所谓“失贞”的女性呢？其实，许许多多女性早已充满自信了，她们说：“哪里是他不要我，根本就是我不会要他！”她们说：“嫁鸡还得养鸡，嫁狗还得训狗，多麻烦！我要找的是人！”

当然，对于那些仍然由于所谓“失贞”而烦恼的女性来说，这些可能都是“远水”或者“空话”。那么就说一点实在的吧：

笔者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在北京市和全国所有的男大学生里，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容忍新娘“失贞”的人，在1991年时占18.5%；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14.2%；以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左右。相反，认为只要新娘现在真心爱自己，就根本不在乎什么“贞操”的男性，在1991年时占34.4%；到1995年已经上升到40.1%；到了1997年和2001年则达到将近一半。其余的男生则是可以不计较某些种所谓“失贞”。

所以，你有充分的机会去寻找这40%多的好儿郎，或者另外40%多的可以商量可以讲理的凡人。至于那14%的夫权殉葬者嘛，躲他们远点就是了；而且，像鲁迅说的那样：连眼珠都不转过去。

很快，烦恼和痛苦的，就该是他们了。

技术上的处女：社会的耻辱

大约从1994年起，中国又出了一件“新鲜”事，一些医院开始做起针对处女膜的手术来，仅湖北就有十几家（《南方周末》1995年3月10日）。一开始，有人把这种手术叫做处女膜修补术，后来有人出来更正，说是应该叫做处女膜再造术。

其实这玩艺一点也不新鲜，早在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就曾经大大风光过一阵。它是为妓女而发明而服务的。因为当时的男人风传，跟处女性交有某些妙不可言的滋味，于是处女妓的身价扶摇直上，达到过一次100英镑的高价点，相当于当时的一座中等商店的价值。许多卖淫老手看了眼红，就投资给一些医生，促使医生用羊肠子等物在她们的阴道口缝上一圈貌似处女膜的东西。一些妓女还做了缩紧阴道口的手术。

在当时和后来的西方，这个行当一直被叫做处女膜伪造术或者人造术。跟现在中国人的叫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观念的表现。中国人说的“再造”和“修补”，大概是想使劲地往“再生”和“再现”那里靠拢吧？而西方人说的“伪造”或者“人造”却突出了“假的就是假的”。

可惜，这个行当的好景不长。到了1880年代，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贫富差距拉大，大批真正的处女涌入卖淫业。同时，嫖客的心理也从购买“初夜权”转向购买性技巧，而性技巧恰恰是处女妓所无从出售的。于是处女妓的价格就一落千丈，便宜到一次只卖5英镑，比其他妓女多不了多少。当然，处女膜伪造术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但是它并没有失传，而且到了1960年代又在日本东山再起。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恢复向经济起飞转变的历史时期，性文化则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对处女膜的崇拜还非常普遍和强盛。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性革命已经开始，日本自己的婚前（跟别人的）性交也有较大的、但隐蔽的增长。为了避免又要性自由又要贞洁牌坊的苦恼，许多准新娘就再次求助于这种处女膜伪造术，使它又一次兴旺起来。

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人人都明白那不过是样子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开玩笑的话：“你是不是推迟两个星期结婚啊？”它说的是，伪造处女膜以后要休息两个星期，才能开始性交。如果一个新娘要求推迟婚期，那么她“奉献”给新郎的那片薄膜就大可怀疑了。

这个玩笑表明，当时的日本青年已经开始怀疑和否定处女膜的价值和意义。果然，1970年代以后，日本的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加、日益公开，处女膜伪造术当然也就越来越日薄西山。

大约是由于跟当年日本同样的原因，这种手术又一次在90年代的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复兴基地。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安慰术，是试图用纯技术手段，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定规之间寻找一条生路，哪怕明知是虚幻的也罢。国内已经有一些人批评这种伪造术，但是往往并没有说到根子上。批评者一来往往去指责那些非要那层膜不可的新郎们；二来常常纠缠于医生该不该施行这种手术。这些都对，都应该说。但是如果深入深入到性活动与性别权势关系的层次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男权社会并不是欣赏处女膜本身，而是用它来压迫女性。

处女膜被说成女女性构造的唯一区别，因此女人的这个天生之物被说成是女性生来低人一等的证据，是社会格外压抑和束缚女人之性的天然理由，也是社会对男女实行不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的“生理依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还在相信处女膜有任何价值，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社会就一定仍然是男女不平等的。在90年代的中国，那些自愿伪造处女膜的女性，实际上是自寻枷锁，甘愿为奴。尽管她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同情的具体理由，但是这种自甘卑下的客观结果却是无法逃避的。至于那些鼓吹或者纵容这种手术的人，客观上是为虎作伥，至少也是留着清朝的辫子。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天下的处女都不要那层膜，或者说“天下从此无处女”，传统男权社会的“处女膜崇拜”，才能被彻底破除掉。

如果说这种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在中国国情下，“处女膜崇拜”会带来种种“假贞操”，却是人们很少想到的。

社会越是强调处女膜的道德价值，女性越是想拼命守住这道“最后防线”，就越是等于在说：只要这个膜没有破，其它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根据笔者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分别对北京市和全国所有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虽然真正发生性交合（处女膜当然破裂）的人只有10%左右（2001年达到约17%），但是发生过种种性爱抚行为的人却高达30%左右。即使在调查前的半年之内，有过性爱抚的人也比真正性交合的人多2倍左右。

这里所说的性爱抚，是指超过接吻的、直到双方生殖器发生接触却没有插入的各种行为。从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爱抚行为与真正的性交合一样，也可以引发性高潮、获得性满足，也是不折不扣的“性行为”。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不论双方怎么爱抚，爱抚多深，双方都仍然是“贞洁”的。结果，一些人为了保持“处女身”，连口交和肛交都做过了，唯独没有插入阴道，因此他们也就照样陶醉在自己的“贞操”之中。这种“技术上的处女”，这种“狭义的贞操”，难道还不够虚伪，还不够荒谬吗？可是，它们恰恰是被“处女膜崇拜”给逼出来的，而且，社会越强调贞操，这种情况就会越多，直到有一天全社会都充满了虚伪，或者被这种虚伪逼得不得不大造其反。

现代人需要的“贞操”是什么？不是膜的完整，而是爱的专一。这，还用多说吗？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于“死要面子活受罪”了，才把伪造处女膜闹得沸沸扬扬。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耻辱吗？

1991—2001：大学生没有“性革命”

美国在60年代出现过一次“性革命”。当时的人们，主要是根据美国大学生里性行为的急剧增加，才发觉“性革命”已经到来的。

自从198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感到，“性革命”似乎已经在我们身边出现。但是有意思的是：不管社会上流传着多少谣言与猜测，“性革命”却并没有在大学生里出现。也就是说，从1991年到2001年，大学生们的性行为（当然是婚前的）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1991年—2001年本科生的婚前性行为比例（%）

| 性别 | 调查范围 | 接吻 | 性爱抚 | 性交 |
|----|------------|------|------|------|
| 男生 | 北京1991年本科生 | 36.3 | 31.4 | 12.9 |
| | 北京1995年本科生 | 31.8 | 26.7 | 10.1 |
| | 全国1997年本科生 | 39.5 | 25.6 | 10.9 |
| | 全国2001年本科生 | 44.5 | 31.7 | 20.0 |

| | | | | |
|----|------------|------|------|------|
| 女生 | 北京1991年本科生 | 46.5 | 27.8 | 4.9 |
| | 北京1995年本科生 | 36.4 | 23.7 | 7.5 |
| | 全国1997年本科生 | 45.5 | 28.9 | 8.4 |
| | 全国2001年本科生 | 47.2 | 27.0 | 12.8 |
| 总计 | 北京1991年本科生 | 39.8 | 30.3 | 10.5 |
| | 北京1995年本科生 | 33.2 | 25.8 | 9.4 |
| | 全国1997年本科生 | 41.4 | 26.7 | 10.1 |
| | 全国2001年本科生 | 45.7 | 29.7 | 16.9 |

但是，本科生毕竟只是中国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我们考察全体中国成年人，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此外，1991年到1997 年这个时期，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如果我们把眼界扩大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一场急剧的“性革命”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成年男女中的历史变化

我们按照被调查者14岁的时候恰好处于什么年代，把现在20—64岁的中国人划分成6代人：

1. 解放初期（现在56—64岁）、2. 大跃进后（现在49—55岁）、3. 文革前期（现在42—48岁）、4. 文革后期（现在36—41岁）、5. 改革初期（现在26—35岁）、6. 1989年后（现在20—25岁）。

这样划分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不同时代的人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有什么区别，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高压不断加强，中国人的婚前性行为比例被压缩到很少；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却急剧上升。

首先来看看男性中的情况：

1. 登记前的性行为

在“大跃进”的那一代人中，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男人只有22%，比他们的上一代（解放初期那一代）减少25个百分点之多。可是到了“文革后期”，比例就恢复到50%，与解放初期那一代人基本持平了。改革开放以来，比例剧增到61%。虽然在1989年以后的这一代人中，比例低到约41%，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男人还太年轻，只有20—25岁，其中相当多的人还没有结婚，因此也就谈不到发生登记前的性行为。

如果说，中国人其实一直就比较宽容“先上床后登记”，因此上面的图表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历史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借着看看，婚礼前性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婚礼前的性行为

在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性中，只有区区2%的人在婚礼前发生过性行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初期的大约6%。这表明在那20年里，男人们确实是遵守着“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高度政治化的道德戒律。

可是到了“文革”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小变，有过婚礼前性行为的男人上升到11%。然后，改革开放刚一来，就再次猛增1倍，达到22%。到1989年以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男人，又是经过20年左右，比例已经高达35%了。这是何其急剧的增长啊。

3. 已婚者的婚礼前的性行为

上面所反映的，是有过婚礼前性行为的男人，在20—64岁中国全体成年人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我们只看那些现在已经结婚的男人，那么他们当中“婚礼前就上床”的人的比例，增加得更惊人：

在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人中，“先上床再办婚礼”的比例微乎其微，只有3%，近乎于无。大跃进那一代上升到17%，但是直到“文革”后期，也不过是持平在20%左右。可是在改革初期那一代人里增加到36%，到1989年之后的这一代人里，比例居然剧增到86%。也就是说，情况基本被颠倒过来了，在时下的小伙子里，“先办婚礼再上床”反而少

之又少，成为奇怪的现象了。

当然，婚礼前的性行为也仍然主要是发生在后来真的结婚的两个人之间，也许仍然不能算作“性革命”的本质反映。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婚前与别人发生过性行为的男人有多少。

4. 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

无疑，结婚之前与别人发生性行为是中国性文化的大忌，因此这种情况的发生率直到现在都还相当低。这表明：中国当前的“性革命”仍然远没有与国际接轨。

但是历史的变化也仍然非常醒目，解放初期是约8%，最低的是“大跃进”那一代男人的5%，文革前期与后期是13%和17%，改革初期则上升到22%。也就是说，在时下的新郎里，有五分之一还多的人，实际上已经在别人那里获得了性经验。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中国2000年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居然还把“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写进去，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看来，这种“相互忠诚的义务”显然并不包括婚前必须“专一”；否则为什么不规定：结婚时已经“失贞”的那一方也应该受到惩罚呢？

如果说，不这样规定是为了保护女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女性的历史发展中，是不是也出现了基本相同的轨迹呢？

成年女性中的历史变化

1. 登记前的性行为

在前后六代人里，女性中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虽然远少于男性，但是也同样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趋势。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初期，在三代中国女性中，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只占9%到12%。也就是说，近乎90%的女性一直坚守着古老的“婚前贞操”，没有政府的正式“批准”就决不肯上床；就象大约两千年来不是明媒正娶就决不肯结婚一样。

但是刚到“文革”后期，女性几乎提前解放了，登记前性行为的发生率一举增加将近2倍，达到30%；到了改革初期的那一代则再上升到34%。^[2]当然，1989年之后的这一代少一些，是27%，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这一代人里还有许多人没有结婚，也就谈不到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那么，这种解放为什么偏偏提前发生在“文革”后期呢？我们没有询问这个问题，因此只能猜测：在“文革”初期，由于政治动乱深刻地影响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时结婚必须经过“政审”，而且很容易被说成是“追求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需要“斗私批修”，所以很难普遍实现“女大当嫁”。这种不人道的压力持续到“文革”后期已经将近10年，普通女性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抗了，所以“先上床再说”的情况才会突然剧增。

这并不是“性革命”，只不过是一种针对“文革”中那种“无性文化”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女性其实也并没有想解放到婚姻之外去。她们只是使用激进的手段来争取自己原有的正常结婚的权利。这其实是强化“婚姻神圣”。

下面的连续两个情况，基本上可以证明我们的这个猜测：

2. 婚礼前的性行为

在“文革”后期，当女性中的“登记前性行为”比例一跃而上高达30%的时候，真的在举办婚礼之前就上床的比例，在所有成年女性中只占区区4%；而且与前3代人（2%、1%和2%）相比并没有急剧的增加。即使在所有那些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女性中，“先上床后办婚礼”的比例也只占12%，大约是八分之一还不到。这虽然比前三代人（1%、5%和11%）有所增加，但是绝对比例并不多。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女性并不想追求“婚前性自由”，还是要堂堂正正地结婚，只不过正式登记结婚很困难，甚至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登记，所以才不得不先办了婚礼再说。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文革”那种把一切私人事务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表现”的历史时代里，在那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政治高压的笼罩下，最容易守规矩的中国女性中却有30%的人胆敢不登记就上床，这可真是一种大讽刺。也许这就是“文革”号召“造反有理”的直接产物吧？

除了用来分析“文革”以外，上面的两个情况还可以充分地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变化虽然远远小于男性，但是也够“不守妇道”了。在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女性中，不办婚礼就上床的人有10%；在所有登记前就有过性行为的人中则占到37%，超过三分之一。

当然，这也仍然不是女性的“性革命”。因为从下面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绝大多数“婚前性行

为”，仍然是跟丈夫发生的。

3. 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

在解放初期的那一代女性中，这个比例是6%。自后来的两代女性中，逐步下降到4%和2%。到了文革后期上升到8%；但是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女性中真的在婚前与别人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仍然很少，只有6%，而且少于前一代女性。

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说明女性中真正的“性革命”还远未发生之外，也许还可以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性文化特征：那时不知道有多少“道德法庭”在审判“陈世美”，所以那时的女性可能都害怕自己不幸成为“秦香莲”。结果，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当然就会更少；千年的“贞操观”当然得以强化。也许因为，这就是当时正在大肆吹捧的“80年代的新一代”的主要特征。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里，无论跟谁，女性第一次过性生活时的平均年龄都非常非常晚，而且历史变化不大。从第一代到第六代的女性，分别是平均21.2岁、20.7岁、23.1岁、22.4岁、22.4岁和21.2岁。

如果我们可以不考虑最近几代女性的月经初潮在不断地大大提前，也不考虑这已经是全世界历史上最晚的了；那么，女性的首次性生活发生得如此之晚，也许是保持传统的福音，是控制人口的良策。

可是，女人容易管住，男人却不那么驯服：

从文革初期那一代男人的约24岁到1989年之后这一代的约22岁，男性的首次性交年龄平均已经提前2岁还多，已经降到“法定结婚年龄”之下了。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一代的小伙子中，上床、结婚、守法登记这三者已经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这当然也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之变，可是其中还是隐藏着一个玄机：在最年青的男人里，发生过各种“性交易”的剧增了。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放到本书的后面去专门分析吧。

中国特色：“婚礼前性行为”与“登记前性行为”

在我所看过的谈论婚前性行为的文字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讨论一下那个“婚”字究竟指的是什么。似乎谁也不愿意承认，在我国的广大地区里与众多人口中，“办了婚礼就是结婚了”的习俗，一直是而且仍将是占据主导地位社区共识与群众意愿。

正是因此，广大地区的众多人口所反对的“婚前性行为”，其实只是指连婚礼都没办就睡到一起去了。这与“知书达礼”者和有权有势者所大加鞭挞的“性解放”，基本上是两回事。广大地区的众多人口实际上仍然在遵守着自己的道德规范，并没有什么“婚前性自由”。不信，请看下面的表7-1里的统计结果：

表7-1：按照不同的判定标准计算，成年人总体中的婚前性行为比例（%）

| 统计标准 | 举办婚礼之前有性生活的人 | | | | 登记结婚之前有性生活的人 | | |
|------|--------------|-----------------|-----------------|------------|----------------|-----------|---------------|
| | 承认婚礼前有性的人 | 承认婚礼前+目前同居+偶然有性 | 承认婚礼前有性+离婚丧偶者有性 | 推算所有婚礼前有性者 | 仅仅发现初性年龄小于登记年龄 | 仅仅承认登记前有性 | 发现年龄差+承认登记前有性 |
| 男 | 8.5 | 13.0 | 13.3 | 13.9 | 17.6 | 33.4 | 42.0 |
| 女 | 3.9 | 5.0 | 5.3 | 5.5 | 9.4 | 17.5 | 22.7 |
| 总计 | 6.2 | 9.0 | 9.3 | 9.7 | 13.4 | 25.5 | 32.1 |

也就是说，如果把“结婚”定义为举办婚礼就算的话，那么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在6.2%到9.7%之间。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定，只有去正式登记才算结婚的话，那么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就上升到13.4%到32.1%之间。

那么，在所有发生过任何一种婚前性行为的人里，究竟有多少人是在举办婚礼之前就上了床呢？农村人与城市人大不相同。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这两个影响最大的因素之后，农村人在婚礼前就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比城市人要少61%。

从实际发生率来看，在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里，农村人只有20.5%是发生在婚礼之前；而城市人却是36.6%，比农村

人多出16个百分点。

这还仅仅是考察被调查者现在的居住地。我们知道，对于年龄较大的人来说，婚前性行为往往发生在较早之前，所以现在的居住地也许并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因此我们来看看被调查者在14岁的时候（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居住在什么行政级别的地方，以及他们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比例各是多少。

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这两个影响最大的因素之后，从低往高看，被调查者14岁时的居住地的级别每提高1级，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加58%。

实际发生率见表7-2。

表7-2：14岁时的居住地与两种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

| | 举办婚礼之前 | 婚礼后，登记前 |
|--------|--------|---------|
| 村里 | 21.3 | 78.7 |
| 镇里 | 37.9 | 62.1 |
| 县城里 | 47.9 | 52.1 |
| 县以上城市里 | 39.7 | 60.3 |
| 总计 | 27.0 | 73.0 |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在村镇两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把登记前性行为与婚礼前性行为区分得相当清楚。人们容易宽容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在农村里尤其是这样。

也就是说，在县以下的农村社会里，人们不管政府怎么规定，仍然把举办婚礼认为是正式结婚，仍然把婚礼之前就上床认为是“婚前性行为”，而且仍然非常反对它。所以在村里，婚礼前的性行为才会少到只有五分之一强。或者说，在农村世界里，人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婚前性行为”仍然非常少。因此，除了某些脱离实际生活的或者另有所图的官员之外，没有什么人会对此大惊小怪。

这个论断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检验：一般来说，人们对于某种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越是宽容，那么自己从事该种婚前性行为的可能向也就越大。所以，我们可以把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作为一个因素，把人们实际上有过哪一种婚前性行为（登记前还是婚礼前还是与别人）作为另一个因素，看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哪个强哪个弱。

结果我们发现：在各个社会阶层里，农村劳动者比城市里的任何阶层都更加清楚地区别开登记前的与婚礼前的性行为。

在农村劳动者中，在控制了年龄与性别的影响之后，在观念上宽容不宽容婚前性行为，对于自己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登记前的性行为，影响比较小（logitic回归的标准系数是0.204）；但是对于自己是否真的在婚礼前发生过性行为，影响却相对大（logitic回归的标准系数是0.043）。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对于婚前性行为一点都不宽容，那么与那些态度非常宽容的人相比，自己在登记前就上床的可能性是五分之一；可是自己真的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却只有区区4%。也就是说，同样是反对婚前性行为，可是在婚礼前就上床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登记前的性行为。

这说明：无论农民赞成还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婚前性行为，主要是指还没有举办婚礼就上床，而不是没有去政府领取结婚证就发生性行为。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仍然坚持认为：办了婚礼就是婚后，没办婚礼才是婚前。

可是在城市里，婚礼前的性行为却比较多了。尤其是在县城里，它几乎已经与婚礼后的性行为平分秋色了。也就是说，即使从一般老百姓的眼光来看，真正的婚前性行为也够多了。这才是“性革命”的真面目。

这对我们的现行规定真是一个大大的讽刺。如果我们把婚前性行为视为一种错误甚至罪恶的话，那么我们目前那种非要每对新婚夫妻都来登记，否则就要宣布人家是无效婚姻的不讲理的做法，恰恰使得这种错误或者罪恶扩大了1.4倍到5.2倍。反之，如果我们的公仆们稍微懂一些婚姻社会学的常识，承认办婚礼也是结婚（哪怕要求人家婚礼后再补登记），那么所谓婚前性行为的错误或者罪恶，就会只是现在的19%到72%之间。

这其实是一切试图用法律来约束道德的人的共同尴尬。如果法不严，就没有多少人来遵守；可是法太严了，又会生产出更多的违法者，结果还是法不责众，白白损失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不再把法治解释为“我拿法

治你们”的时候，这样的尴尬才会最终消失。

用“是”与“不是”的二元对立观点来看待“婚前性行为”，而且拒绝把各种不同的情况区分开，这不仅是一个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态度的问题。未婚夫妻之间发生的婚前性行为，实际上与新婚之夜的性交没有任何区别，对当事人、对社会都毫无损害。如果非要把这样的事情归入“婚前性行为”大加谴责，那么唯一的依据就是所谓的“不合法”。可是，我们的脑袋再笨也应该想到：这究竟是人民错了，还是法律错了？

各种不同的“婚前性行为”

为了遵纪守法，我们最好还是以结婚登记为标准来讨论婚前性行为的问题吧。不过请不要忘记：那些既没有结婚也没有与人同居的人所发生的性行为，也是婚前性行为之一种。请看表7－3和表7－4。

表7－3：目前未婚的人有性行为的比例（%）

| | 曾经有性， 目前没有 | 目前有性 | 目前是同居 | 有婚前性行为总计 |
|----|---------------|------|-------|----------|
| 男 | 1.7 | 1.8 | 0.9 | 4.4 |
| 女 | 0.3 | 0.4 | 0.4 | 1.8 |
| 总计 | 1.0 | 1.1 | 0.7 | 2.8 |

表7－4：目前已婚者有过的各种婚前性行为的比例（%）

| | 婚前 只与配偶 | 婚前 只与别人 | 婚前与配偶 还与别人 | 目前已婚者的 婚前性行为总计 |
|----|------------|------------|---------------|-------------------|
| 男 | 27.0 | 4.9 | 8.8 | 40.6 |
| 女 | 17.8 | 2.2 | 2.5 | 22.5 |
| 总计 | 22.4 | 3.5 | 5.6 | 31.6 |

这样，把未婚而有性、未婚而同居、婚前有过性这三种情况相加起来，就可以得到所有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在男性中是45.1%，在女性中是23.7%，总计34.4%。

34.4%这个数字，可能已经够高了，但是还有两种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婚前性行为”：那些目前是再婚的人，如果与前妻或者前夫也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那么该不该统计进来呢？那些目前已经离婚或者丧偶而且没有再婚的人，如果也与别人有过性关系，那么算不算是“婚前性行为”呢？请看表7－5。

表7－5：再婚离婚丧偶者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

| | 与前夫妻 有婚前性 | 离婚丧偶 而目前有性 | 离婚丧偶 而现在有主伴侣 | 总计 |
|----|--------------|---------------|-----------------|-----|
| 男 | 0.7 | 0.3 | 0.4 | 1.4 |
| 女 | 0.2 | 0.1 | 0.3 | 0.6 |
| 总计 | 0.5 | 0.2 | 0.3 | 1.0 |

也就是说，如果加上这种情况，那么婚前性行为的总人口比例就会上升到35.4%。

婚前性行为：与后来的配偶还是与别人？

不过，我们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其实并不是“向上床后登记”，而是对方在跟自己结婚之前，还跟别的人有过性生活。对女性来说，这就是所谓“失贞”。因此毫不奇怪，在所有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当中，与别人发生过的人非常少，只有四分之一多一些。女性在婚前与别人发生性行为的比例，更是远远少于男性。请看表7-6。

表7-6：目前已婚者在婚前与别人有过性行为的比例（%）

| | 在成年人总体中的比例 | | 在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所有人中 | |
|----|------------|------|---------------|------|
| | 曾经与别人 | 只与别人 | 曾经与别人 | 只与别人 |
| 男 | 13.6 | 4.9 | 30.2 | 10.8 |
| 女 | 4.7 | 2.2 | 19.8 | 9.4 |
| 总计 | 9.2 | 3.5 | 26.7 | 10.3 |

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也是农村少而城市多。在所有发生过婚前与别人性行为的人里，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这两个影响最大的因素之后，目前居住在农村的成年人的发生可能性，比目前居住在城市的人要少53%。

如果从人们14岁时的居住地来看，情况基本上也是一样。控制了性别与年龄之后，从村往上，居住地每提高1个行政级别，发生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23%。

就实际发生率而言，在成年人总体中，被调查时住在农村的人，婚前性行为比例是**6.9%**；住在城市的是**13.6%**。如果按照14岁时的居住地来看，那么当时住在村里的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是**7.9%**；住在镇里的是**10.6%**住在县城里的是**21.8%**；住在县以上城市的则是**9.7%**。

上面的分析表明：

首先，在农村世界里，婚前“贞操”的观念仍然十分强大，因此，敢于在结婚之前跟别人有性生活的人，只不过占7%—8%。

其次，在县以上的大中城市里，婚前与别人有过性行为的人，也只不过接近10%而已。可是在县城里，这样的人却是大中城市里和镇里的2倍。这突出地表明了“县城世界”其实才是中国的“性自由乐园”。

第三，就全体中国成年人而言，婚前与别人有过性行为的人还不到10%。这足以让那些仇恨“婚前性行为”的人士们闭嘴：在社会生活的什么方面，在人们的什么行为上，会没有10%的例外呢？难道我们到了21世纪，还应该去幻想“文革”中的那种“祖国山河一片红”吗？

婚前性行为：现在已经结婚了，还是没有结婚？

正是由于在所有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当中，“先上床后登记”的人远远多于跟别人有过的人，所以如果按照被调查者目前的婚姻状况来看，那么仍然没有结婚的人所发生的婚前性行为，远远少于那些已经结婚的人。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在男性中，目前未婚者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只是目前已婚者的29%。在女性中，未婚者的可能性仅仅是已婚者的11%。

就实际发生率而言，在男性中，未婚者仅为31.3%；而已婚者则是46.9%。在女性中，未婚者仅为9.5%，而已婚者是24.7%。这些差异均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1. 城乡差异

在男性中，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农村成年男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比县以上城市中的男性要低 31%。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成年男性的所有登记前性行为发生率是42.0%，县以上城市里的成年男性则是51.2%，比农村高9个百分点。

在女性中，农村人的可能性比城市人低46%之多。农村女性的实际发生率只有20.4%，而城市女性则高达30.3%，相差10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任何人从常识出发就可以作出上述判断。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使用目前最科学的方法来验证了它。

2. 居住地的差异

从被调查者的居住地的行政级别来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男性中，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登记前性行为发生率最低的当然是农村男性。可是最高的地方，却并不是省会和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城市，而是县城或者县级市（比农村多55%的可能性）和地级城市（比农村多36%的可能性）里的成年男性。

在女性中则是另一种情况。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除了农村女性和进城女农民最低之外，从县城直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女性都差不多。但是女性之间的城乡差别却比男性大许多。城市女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要比农村女性多出81%（县城）—169%（省会）。具体的发生率请看表7—7。

表7—7：居住在不同行政级别地方的人的所有登记前性行为发生率（%）

| | 男性 | 女性 |
|--------|------|------|
| 农村 | 42.0 | 20.4 |
| 进城农民 | 53.5 | 30.8 |
| 县级市/县城 | 53.4 | 31.0 |
| 地级市 | 49.0 | 27.8 |
| 省会 | 50.0 | 33.0 |
| 京沪穗 | 46.2 | 30.8 |
| 总计 | 45.1 | 23.7 |

当然，登记前性行为一般都发生在男性比较年轻的时候。到我们调查的时候，他们的居住地可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特意询问了每个男性，在他14岁的时候，居住在什么行政级别的地方。我们的假设是：一般来说，14岁的时候正是男性进入青春期前后，正是性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那时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对于他会不会发生登记前性行为，应该产生明显的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个假设，而且与上述的统计结果相吻合。

在男性中，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进入青春期时居住在村里的男性和居住在县以上城市里的男性，后来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差不多，都是最低的。当时居住在镇里的男性，后来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比前两者多85%。当时居住在县城或者县级市里的人则多出107%。

在女性中，差别没有男性中那么大。只有那些14岁时居住在县城里的女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比居住在农村的女人多出84%。其余的情况，互相之间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具体的百分数也能说明这个现象：14岁时居住在县城里的人，登记前性行为最多；男性中是62.0%。女性中是34.4%。可是住在村里的男人只有42.8%，女人只有21.8%；住在县以上城市的男人只有45.8%，女人只有29.6%。

那么，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大城市里的登记前性行为应该更多，而我们的统计结果却是县城里最多呢？主要是因为：与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县城里的人是我国目前在性的方方面面都最活跃的人群。不过，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涉及到许多后面将论述的情况，因此在这里暂不展开了。

附带地说一下，我们所调查的成年男性，如果目前居住西北地区或者华北地区，那么他们的登记前性行为发生率就

是最低的。如果居住在中南内地，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比前两者多出52%。如果居住在东北地区，就多出91%。如果居住在南方沿海地区，就多出224%。如果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则多出303%。不过，我们的抽样方案并不能分别地代表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因此这种情况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3. 家庭背景

我们假设：人们会不会发生登记前性行为，与他们从小生活在什么阶层的家庭里可能会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询问了他们的父亲的主要职业。

不过，就男性而言，经过统计分析，我们的假设被推翻了。

在男性中，父亲是工人和农民的人，登记前性行为发生率最低，只有41.6%和42.7%。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与他们相比，父亲是从事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普通人员，儿子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加215%。但是除此之外，父亲的其他任何职业，都没有对儿子的登记前性行为发生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可是，我们却在女性的情况当中，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在女性中，父亲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人，登记前性行为的实际发生率最低，只有12%。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与各级领导干部的女儿相比，一般干部或者职员的女儿，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是前者的2.2倍。工人的女儿是前者的2.4倍。个体劳动者的女儿是前者的2.5倍。如果父亲是厂长、经理、老板，那么女儿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则是前者的3.3倍。

就实际发生率来看，情况也是一样：父亲是厂长、经理、老板的人，登记前性行为的发生率是40.0%；个体劳动者的女儿则是32.4%；父亲是工人、科技人员、教师、知识分子、一般干部、职员、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普通人员、农业劳动者的人，发生率在28.9%到22.6%之间。

如果我们相信，女儿有没有登记前性行为，主要是由父亲对她管束得严不严所决定的；那么上述情况就可以说明一个在任何国家都是源远流长的社会性别现象：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的父亲，对于儿子在婚前所发生的性行为，基本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不同家庭背景的成年男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与实际发生率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但是对于女儿，不同职业的父亲就会有显著不同的约束。

各级领导干部最害怕女儿“失贞”。这倒不是他们更加为女儿着想，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害怕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名声（在官场上，名声会影响乌纱帽和仕途）。

农村里的各种劳动者也害怕女儿“失贞”。但是这并不仅仅是父亲的自私，而是因为生怕女儿嫁不出去或者嫁不好。

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普通从业人员，恐怕是因为自己见得太多了，才对女儿管束较严。

反过来，对女儿不那么严加看管的父亲，恰恰都是“体制外”的人（个体劳动者、厂长、经理、老板）。也许，这样的父亲更没有时间看管女儿；也许他们更不在乎女儿“失贞”对自己名声的影响；也许他们绝的登记前性行为也是实现“嫁得好”的一种途径；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体制”所宣扬的那一整套意识形态与道德。可惜，作为一个问卷调查，我们无法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只能留待别人的研究去发现了。

4. 党的纪律约束

家教的影响虽然重大，但是路毕竟是男性自己走出来的。在日后影响他们的诸多社会因素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是否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

在控制了年龄差别与城乡差别的影响之后，如果成年男性是党员，那么他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会比非党员低38%。

从现实情况来看，非党员男性曾经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占46.6%；而党员男性只占36.0%。

可是在女性中，情况却大不相同：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城市中的女性是不少党员，对于她们会不会发生登记前性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农村女性中，党员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要比非党员多出16个百分点。但是这个

差异却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调查中没有直接询问其原因，只能作出如下的猜测：同样是入党，对于男人和女人却具有不同的意义。

如果能够入党，那么男人比女人更加可能获得各种升迁，所以男人的入党实际上是踏上仕途的开始。正因如此，所以男人即使在准备入党的时期里，也不得不按照官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极力避免各种婚前性行为给自己带来的损害。

女人入党之后，仕途升迁的可能性比男人小得多，青云直上的可能性就更小。因此，入党对于女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吓阻作用，也就比对男人的小得多。

5. 性发育的早晚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男性首次遗精的年龄越早，他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首次遗精是出现在23岁之前，那么每提前1岁，可能性就增加35%。反之，遗精年龄每推迟1岁（无论到多晚），可能性就降低24%。

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男人的性发育越早，他的性驱动力就越强。

这也可以从自慰（手淫）的情况中得到证明。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那些在17岁以前就开始自慰的男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比那些从来没有自慰过的男性要高94%。实际发生率是：17岁之前开始自慰的，登记前性行为发生率是60.7%；17岁开始自慰和18—20岁开始自慰的是47.2%到52.2%；21岁及以上才开始自慰的与从来没有自慰过则是36.2%和43.6%。

这表明：开始自慰越早，男性的性驱动力越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自然也就越高。

可是，我们并不想陷入“唯性主义”的泥坑，因为登记前性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性的发泄，它当然也是一种爱情行为。因此，我们需要赶快说明两点：

第一，对于女性而言，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所有的性发育（包括月经初潮的年龄、是否有过自慰、什么年龄开始自慰的），都与登记前性行为的发生可能性不相关。也就是说，女性发生不发生登记前性行为，并不是由性的驱动力决定的。这是男女之间的重要差别之一。

第二，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

6. 对于自己的魅力的评价

我们的提问是：您认为，在年龄相仿的异性眼里，您自己的魅力有多大？统计结果发现：越是认为自己魅力大的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男性中，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与那些自认为魅力小的男性相比，自认为魅力不太大的男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是前者的2倍；魅力比较大的是前者的2.6倍；魅力很大的则是前者的10.8倍之多。

在女性中，那些自认为魅力不太大和比较大的人，与自认为魅力小的人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那些自认为魅力很大的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却是魅力小的人的5.5倍。

在实际发生率上，情况也是一样。在男性中，认为自己魅力小的人的登记前性行为只有27.7%，魅力不太大的是42.5%，魅力比较大的是51.4%，魅力很大的则高达80.5%。在女性中，趋势也是一样：魅力小的是13.2%，魅力不太大的是20.2%，魅力比较大的是29.6%，而魅力很大的则高达70.6%。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的登记前性行为

为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我们专门选定了40岁（含）以下的人口来分析。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这些人最小的只有19岁左右，因此他们的登记前性行为应该是基本上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与以后。此外，由于农村的登记前性行为相对更少，因此我们选定城市人口来分析。

在城市40岁以下的人口中，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是49.7%，其中男性是61.4%，女性是37.9%。

但是最令我们惊讶的并不是这个百分数，而是我们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上述那些在总体上影响了人们的登记前性行为的各个因素，甚至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对于城市中40岁以下的人口，几乎都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了。

也就是说，在人们是不是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这个问题上，只要是城市人，只要是40岁以下；那么无论年龄是大还是小、文化程度是高还是低、是不是党员、自己青春期开始的时候（14岁）居住在什么级别的地方、性发育是早还是晚、有没有过自慰、自认为魅力是大还是小；都没有显著的差别了。

这并不是咄咄怪事，而是充分说明了一个人们很可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前性行为大潮”，并不是哪一个阶层发动和领导的，也没有哪一种人群单独地成为“急先锋”或者“痴迷者”。这是一种全社会的涌动，是整整一代人的正步走。

或者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几代人里，发生婚前性行为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她）所属的社会阶层和周边环境的重大影响，只能是某些特定的人群来一个“敢为者先”。可是时过境迁，自从1980年代以来，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无论家长、单位还是社会，对于“先上床后登记”都已经日益宽容。结果，登记前性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一种在整整一代人里接近半数的普遍行为了。尤其是，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们，已经基本上没有社会差异了。如果还想在他们中间抓出“一小撮”“带头羊”来，那可真是枉费心机。

当然，一点差别都没有也不可能。那么仅存的差别表现在哪个方面呢？这恐怕又是一种人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在男性中，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自己的个人收入越高，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向也就越高。如果按照当地的总体工资水平，把个人收入分成从低到高的5个等级，那么收入每提高一个等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增加17%。如果把个人收入分成低中高3个等级，那么每提高一个等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9%。

如果我们暂不考虑当地的工资水平，仅仅看个人收入的绝对数字，那么在登记前性行为的实际发生率这方面，“贫富差距”也够大的。在城市40岁以下的男性中，占总体40%的最低收入的男人，只有38.1%的人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在占总体45%的中等收入的男人中，这个比例是59.3%。那些收入最高的5%的男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高达82.5%。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最富的男人是最穷的男人的6.7倍。

这恰恰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征：个人收入的高低这个经济因素，而不是传统上的“阶级”等政治因素，对个人的行为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

可能有人会因此而得出结论：婚前性行为也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可是那些中等收入的男人呢？他们也有几乎60%的人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难道我们连男人仅仅达到中等收入也要谴责吗？

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就是男人14岁时居住地的行政级别。那时居住在县城里的男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与那些居住在农村里或者县以上城市里的男人相比，增加16—18个百分点，达到74.3%之多。不过，这种县城男人的特殊性，我们还是放到后面去专门讨论为好。

中国人日益宽容

即使我们仍然按照登记才算结婚来看问题，那么在婚前与什么样的人发生性行为就很重要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先上床后登记”实际上是非常宽容的，倾向于认为它不是道德问题的人高达54.4%（男61.2%，女47.6%）。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我们中国独有。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美国，人们也是倾向于在“严肃的”和“随意的”婚前性行为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那些发生在相爱的或已订婚的两人之间的性关系，要比仅仅基于身体上的相互吸引而发生的性关系更易为人们所容忍。[\[3\]](#)

但是这种宽容也带有强烈的阶层倾向。

首先，越年轻的人越宽容；反之，从20岁往上，每老5岁，宽容的可能性就减少10%左右；

然后，在控制了年龄因素的影响之后，仍然可以发现下列的显著差异：

女人宽容的可能性比男人要少47%左右；

农村成年人的宽容可能性比城市成年人要少22%。从农村人到进城的民工再到城市居民，每高一级，宽容的可能性就增加31%左右；

除了没上过学的人和小学文化的人基本相同之外，上过初中的人的宽容可能性比他们增加42%；上过高中的人比他们增加32%；上过大专的人增加51%；上过大学本科以上的人则增加105%。

个人收入越高就越宽容，在5级档次上，收入每高一级，宽容的可能性就增加9％左右。

也就是说，大城市的、年轻的、收入高的男性最容易宽容“先上床后登记”。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违背道德的事情。具体情况请看下面的汇总表7—8，其中所列举的情况都构成了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表7—8：总体中各个阶层对于“先上床后登记”的态度（％）

| 个人情况 | 类别 | 倾向不是道德问题 |
|--------|--------------|----------|
| 性别 | 男 | 61.2 |
| | 女 | 47.6 |
| 城乡差异 | 农村 | 51.8 |
| | 县以上城市 | 59.6 |
| 居住地的 | 农村 | 51.8 |
| | 进城农民 | 59.4 |
| 行政级别 | 县级市/县城 | 63.1 |
| | 地级市 | 53.8 |
| | 省会 | 58.8 |
| | 京沪穗 | 74.5 |
| 年龄 | 20-29岁 | 59.2 |
| | 30-39岁 | |
| | 55.3 | |
| | 40-49岁 | |
| | 52.4 | |
| 50-59岁 | | |
| 56.8 | | |
| 60-64岁 | | |
| 31.5 | | |
| 文化程度 | 没上学 | 46.9 |
| | 小学 | 49.8 |
| | 初中 | 58.7 |
| | 高中 | 57.3 |
| | 大专 | 60.2 |
| 大学或者更高 | 65.3 | |
| 每月收入 | 低 | 49.1 |
| | 中低 | 51.7 |
| | 中 | 55.3 |
| | 中高 | 51.3 |
| | 高 | 62.6 |
| 职业 | 从来无职业 | 49.0 |
| | 农村劳动者 | 51.2 |
| | 工人 | 58.1 |
| | 商业服务业娱乐业一般人员 | 56.0 |
| | 个体劳动者 | 58.3 |
| | 职员、一般干部 | 60.8 |
| | 知识分子 | 54.9 |
| | 经理厂长老板 | 75.0 |
| | 各级领导干部 | 45.9 |

观念上的宽容，往往以自己行为上的开放为基础。下面我们就选择城市中的40岁以下的成年人，来看看不同的观念与实际发生登记前性行为之间的联系。结果我们发现：对于“先上床后登记是道德问题吗”这个提问回答“完全不是”的人，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是62.4％；回答“可能是”的人有51.8％ 有过；回答“也许不是”的人有42.3％ 有过；而回答“肯定是道德问题”的人里，只有31.2％的人有过登记前性行为。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倾向于言行一致。在控制了年龄因素的影响之后，从很宽容到很不宽容，每降低一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减少36％。

登记前性行为的一般特征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使用我们这样的问卷调查方式，不可能深入了解人们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原因。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那些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人与那些没有过的人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显著的差异，从而推测出一些在问卷中并没有询问的情况。

在男性中，我们发现了以下一些显著差异，见表7—10。

表7—10：城市40岁以下男性中，登记前性行为者一般特征

| | 男比女 | 婚后住在 | 双方是 | 相识1年内 |
|-----------|-------|-------|-------|-------|
| | 大几岁 | 男方家 | 自己相识 | 有性 |
| 没有登记前的性行为 | 1.02岁 | 14.5% | 16.9% | 25.0% |
| 有过 | 1.30岁 | 32.0% | 39.1% | 58.1% |
| 有过者的可能性多出 | 12% | 109% | 127% | 173% |

在女性中，显著差异少一些，但是与男性中的差异，在性质上差不多，见表7—11。

表7—11：城市40岁以下女性中，有登记前性行为者的一般社会特征

| | 男比女 | 相识1年内 | 相识1月内 | 自己完全 |
|-----------|-------|-------|-------|-------|
| | 大几岁 | 有性 | 有性 | 愿意发生 |
| 没有登记前性行为 | 1.65岁 | 21.3% | 3.0% | 63.0% |
| 有过 | 2.31岁 | 40.9% | 7.8% | 52.8% |
| 有过者的可能性多出 | 11% | 61% | 51% | —35% |

汇总起来，上面的这些统计表格说明的其实只是一件事：与“先登记后上床”相比，登记前的性行为更倾向于是男性主动发起，而且迅速地说服女性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从上面的表格里可以看出：男性比女性年龄更大，社会经验应该更加丰富。男性的家庭更加适合于女性嫁过去；这可能会减少双方的后顾之忧。男女双方是自己相识的，而不是经人介绍；这样也许更容易促进双方感情的升温。女性虽然并不是那么同意，但是在男性的努力之下，双方终于在相识1年之内就上床了。

真正的“婚前性行为”：婚礼前性行为

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国人最能更宽容的就是两个人先上床后登记；反对的是在还没有举办婚礼的恋爱期间发生性行为。因此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些“真正的婚前性行为”的情况。

为了侧重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我们选择了城市里40岁以下的成年人来统计分析（他们的总体发生率是46.9%）。结果我们发现：正如登记前性行为一样，婚礼前性行为也是一种很少有社会阶层差异的现象。也就是说，传统上非常影响个人行为的那些因素，例如文化程度、主要职业、收入水平、家庭背景等等，对于婚礼前性行为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其实就是性别与年龄。在控制年龄影响的条件下，女性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比男性少47%。反之，控制了性别的影响之后，从40岁往下，年龄每降低1岁，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增加15%。

具体情况是：男性中是51.8%，女性中是39.1%。40岁的人中只有22.2%，35—39岁是29.3%，30—34岁是39.3%，25—29岁则是46.8%；而20—24岁的人高达94.1%。

为什么有些人在婚礼之前就上床，有些人却坚持到婚礼之后呢？主要是因为两种人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大不相同。

在所有发生过任何一种婚前性行为的人里，从最宽容到最不宽容的4个等级来看，态度每下降1个等级，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随之下降33%。如果把态度只分成两个等级，那么倾向于宽容的人与倾向于不宽容的人相比，前者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46倍。具体情况请看下面的表格7-12。

表7-12：城市40岁以下的人，越宽容婚前性行为，实际发生率越高（%）

| 婚前性行为是道德问题吗？ | 婚礼前性行为发生率 | 婚礼后，登记前发生率 |
|--------------|-----------|------------|
| 完全不是 | 50.5 | 49.5 |
| 可能是 | | |
| 54.2 | 45.8 | |
| 倾向于宽容小计 | | |
| 52.7 | 47.3 | |
| 也许是 | 34.8 | 65.2 |
| 肯定是 | | |
| 21.4 | 78.6 | |
| 倾向于不宽容小计 | | |
| 31.6 | 68.4 | |
| 总计 | 46.6 | 53.4 |

与别人发生的婚前性行为的分析

在城市4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为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作用也是来自性别与年龄这两大因素，与婚礼前性行为的情况差不多。

如果控制了年龄的影响，那么女性在结婚之前与别人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比男性少67%。反之，在控制性别影响的条件下，年龄每下降1岁，发生与别人的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

实际发生率也是这样：在男性中是23.0%，在女性中是9.2%。在20-24岁的人中是1.4%，在25-29岁中是18.5%，30-34岁是26.9，35-39岁是15.9%，40岁则是17.5%。

与婚礼前性行为一样，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也受到当事人的性观念的强大影响。

在城市40岁以下的成年人里，控制了性别与年龄之后，从最宽容婚前性行为到最不能宽容，态度每降低1级，发生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随之下降27%。如果按照两级来划分态度，那么倾向于宽容的人，发生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的可能性，是不能宽容的人的1.82倍。实际发生率是这样的：认为“完全不是道德问题”的人，22.9%有过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认为“可能是”的人有16.4%，认为“也许是”有12.3%，而认为“肯定是道德问题”的人则只有7.6%。

没有婚前性行为就“纯洁”吗？

1. 概述

在时下人们所常用的“婚前性行为”这个词里，不但“婚前”的定义含含糊糊，而且什么叫做“性行为”也是稀里糊涂。

虽然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只有真的发生了阴茎插入阴道才算是“性行为”（对于女性来说就是“处女膜破损”才算）；可是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性学的定义，而且也实在是因为“毛片”看得太少了。因为除了阴茎插入阴道这样一种最古老的“性行为”之外，要想达到性高潮，人类实际上不知道还有多少种方式，而且在“毛片”里都可以一览无遗

啊。

这种仅仅把阴茎插入阴道算作“性行为”的看法，虽然源远流长；虽然可以减轻那些不太情愿地卷入“婚前性行为”的人的心理压力；但是它也有另外3方面的作用：

首先，这等于在告诉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只要守住“最后关口”，其他的就都可以放心地去做。不管是接吻还是爱抚，甚至是口交或者肛门性交，只要保持处女膜的完好，就一切OK。其实，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在各种爱抚和非阴道性交中，往往可以更快地获得更多的和更加亢奋的性高潮，女性尤其如此。可是按照“以处女膜为准”的道德，这些都不能算作是“婚前性行为”。这种“全身皆可摸、凡事皆可做，唯有处女膜不可破”的道德标准，完全是掩耳盗铃，是“欲纵故擒”，是虚伪到家。

其次，发生婚前性行为的男人并非全是骗子或者色狼，其中许多人也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对女方承担义务。可是，这只能出现在那些“见红”的男女之间。如果仅仅发生过接吻、爱抚、口交、肛交，那么由于它们统统不算“婚前性行为”，男人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必那么负责，女人也就只能吃哑巴亏。男人一辈子的不负责任，是不是就会从此开始呢？

第三，这样吃了哑巴亏的女人，更加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无法接受自己的虚伪，因为她连最传统的“献身”都没有做到，只能相信自己被男人“白占便宜”了，甚至连起诉对方强暴都没有证据。女性的被伤害是不是也是从此开始的呢？

上面这些分析并非杞人忧天。请看看，在婚前已经有过接吻和爱抚的比例吧：在男性中有59.5%的人已经有过接吻，在女性中是30.5%；男人发生接吻的可能性是女人的3.1倍。有过爱抚的人，在男性中是30.6%，女性中是7.5%；男人的发生可能性是女人的5.1倍。

2. 具体情况

婚前的接吻和爱抚虽然多，但是发生的平均时间却并不早，而是出现于超过法定婚龄之后2年左右。这可能表明：接吻和爱抚已经成为恋爱、择偶期间的一种“必修课”。请看表7-13。

表7-13：无婚无性者的各种平均年龄

| | 所有人 | 接过吻者 | 最大者 | 有过爱抚者 | 最大者 |
|----|-------|-------|-----|-------|-----|
| | 平均年龄 | 平均年龄 | 年龄 | 平均年龄 | 年龄 |
| 男 | 23.46 | 23.23 | 29 | 22.82 | 27 |
| 女 | 22.42 | 23.36 | 25 | 22.74 | 25 |
| 总计 | 22.91 | 23.29 | — | 22.79 | — |

那么，什么样的无婚无性者更容易发生婚前的接吻和爱抚呢？看来，至少需要读6年以上的书，人才能明白这些举动都不算“婚前性行为”。或者说，只有达到这样的文化程度，人才会产生接吻的需求；而对于爱抚的需求，则要到上大专以后才会强烈起来。

具体情况是：小学或以下的人有过接吻和有过爱抚的比例是4.3%和4.3%；初中的是45.7%和19.8%；高中的是52.9%和11.4%；大专的是53.8%和35.7%；大学的是50.0%和33.3%。从发生的可能性来说，接吻，小学及以下者仅仅是大学文化的人的44.5%；爱抚则只是57.1%。

除了文化程度以外，自己的收入越多、性发育开始得越早，在婚前发生接吻和爱抚的比例也就会越高。

具体情况是：在收入低的无婚无性者里，有过接吻的是14.3%，有过爱抚的是8.6%。可是在收入中等的人里就上升到46.5%和16.2%；而在收入高的人里则高达69.6%和17.4%。就发生接吻的可能性而言，收入低的人只是高收入者的三分之一。

此外，在无婚无性者中，发育越早，有过接吻和爱抚的比例也就越高。见表7-14。

表7-14：发育越早，有接吻和爱抚的比例越高

| 首次遗精、月经年龄 | 男性 | | 女性 | |
|-----------|-------|-------|-------|-------|
| | 有过接吻 | 有过爱抚 | 有过接吻 | 有过爱抚 |
| 12 | | | 50.0% | 10.0% |
| 13 | 75.0% | 75.0% | 37.5% | 33.3% |
| 14 | 87.5% | 26.7% | 33.3% | 4.0% |
| 15 | 82.8% | 13.8% | 11.8% | |
| 16 | 41.9% | 37.5% | 34.4% | |
| 17 | 20.0% | 33.3% | | |
| 18 | 12.5% | | | |
| 控制年龄后显著度 | .000 | .008 | .392 | .044 |
| 早者可能性 | 1.857 | 1.578 | — | 1.743 |
| 是晚者的几倍 | | | | |

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在自己的社会背景方面，还有一些因素在影响着一个人会不会在婚前发生接吻和爱抚。只不过这些因素的作用虽然都很显著，但是已经不再是成比例的线性关系了。

例如，自己14岁时的居住地的级别以及现在居住在什么级别的地方，都与无婚无性者有过接吻、爱抚的比例显著相关。大体来说，城市人（51.1%接过吻，23.9%爱抚过）显著地多于农村人（39.0%和10.5%）；尤其是爱抚的发生可能性，城市人是农村人的4.1倍。在城市人里，居住在地级市的人是最多的，接过吻的占52.9%；爱抚过的占35.3%。

3. 对比分析

那么，我们所调查到的这些婚前接吻与爱抚的情况，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呢？读者可以参照许多其他调查成果，也可以看看我们在1997年做过的另外一次调查所发现的情况：

1997年4月，我们对全国所有正规高等院校的所有本科生，进行了一次邮寄调查。我们使用的是分层三级随机抽样的方法，直接抽样到个人。我们总共抽中150所高校，446个系的2936名本科生。在置信度为95%，最大允许误差为2.5%的条件下，我们的随机抽样可以代表全国638所高校的142.6万本科生。总共寄回1904份有效答卷，就占到66.6%（三分之二）。

把我们1999—2000年对全国成年人的调查结果中，那些曾经上过大学而且仍然未婚的人的情况，与1997年的调查结果合并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下面的综合统计结果，见表7—15。

表7—15：全国大学生人性行为的报告发生率（%）

| 性别 | 时期 / 活动内容 | 一般 | 一般 | 约会 | 接吻 | 性爱抚 | 性交 |
|----|--------------------|------|------|------|------|------|------|
| | | 来往 | 朋友 | | | | |
| 男生 | 1997年前上中学期间有过 | 96.5 | 81.6 | 36.8 | 21.9 | 13.9 | 4.8 |
| | 1997年上大学期间达到 | 99.1 | 93.5 | 59.9 | 46.7 | 25.6 | 10.9 |
| | 2001年上大学期间达到 | 99.6 | 94.5 | 64.1 | 44.5 | 31.7 | 20.0 |
| | 1999—2000年毕业后未婚者达到 | — | — | — | 56.8 | 43.2 | 60.0 |
| 女生 | 1997年前上中学期间有过 | 97.1 | 79.6 | 30.3 | 16.8 | 9.0 | 2.0 |
| | 1997年上大学期间达到 | 99.4 | 93.5 | 59.6 | 45.5 | 28.9 | 8.4 |
| | 2001年上大学期间达到 | 99.3 | 94.2 | 61.4 | 47.2 | 27 | 12.8 |
| | 1999—2000年毕业后未婚者达到 | — | — | — | 30.8 | 69.2 | 33.3 |
| 全体 | 1997年前上中学期间有过 | 96.7 | 80.9 | 35.8 | 20.1 | 12.2 | 3.8 |
| | 1997年上大学期间达到 | 99.2 | 93.5 | 59.8 | 41.4 | 26.7 | 10.1 |
| | 2001年上大学期间达到 | 99.5 | 94.4 | 63.0 | 45.7 | 29.7 | 16.9 |
| | 1999—2000年毕业后未婚者达到 | — | — | — | 44.2 | 55.8 | 50.0 |

也就是说，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社会阶层中，从异性之间的一般来往直到真的发生婚前性交，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和择偶需求增加而循序渐进地发展的过程。无论施教者加强道德管束也好，进行性教育也好，对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都没有发挥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或者说，从中学到大学的主管者们，不但是瞎操心，而且是瞎忙活。

其中隐含着的逻辑其实就是：“哪怕你日后为非作歹，只要在我治下老老实实就行。”真正关心学生成长（尤其是将来的婚恋幸福）的“头头”有多少呢？保乌纱帽而已。

婚前有过性行为，婚后更幸福还是更不幸？

自从改革开放后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加以来，反对它的人们主要是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强调“贞操”。其实，这实在是无的放矢，因此也很难发挥“消防队”的作用。

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具体人来说，婚前性行为是不是符合道德，这个问题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人们更加关心的是：发生婚前性行为之后，对自己将来的生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根据“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的理论，如果人们日后得到了好的结果，这种“正反馈”就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开，婚前性行为就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增加。反之，如果人们真的伤到了苦果，那么“负反馈”就会成为抑制婚前性行为增加的有力因素。

下面我们就将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婚前性行为的日后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那些“先上床后登记”的人们，在日后的婚姻生活里，因此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是那些有过婚前性行为，但是到我们调查的时候仍然没有结婚的人们，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也为了更加集中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我们专门选择了那些40岁以下的成年人来分析，因为它们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时间，最早也是在1979年左右。

我们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一是登记前性行为对于双方的感情和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二是对于婚后的性生活有什么作用。

这里，我们只分析那些结婚在5年（含）之内的人们，这是因为，如果结婚超过5年，那么会有许许多多其他因素参加进来，一起影响人们的婚姻生活，就很难分清出哪些是婚前性行为所发挥的作用，那些是其他因素的影响。

对于婚后双方关系的影响

总的来看，夫妻在登记前发生过性行为，那么丈夫在日后的婚姻中就会占据优势地位。这表现为以下各个方面：

1. 妻子比丈夫更爱对方。

如果夫妻双方是在登记前发生的性行为，那么在正式结婚后，妻子更爱丈夫的比例（**20.1%**）就会超过那些登记后才上床的妻子（**11.2%**）。这种妻子更加爱丈夫的情况，就其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前者是那些登记后才上床夫妻的2倍。

2. 双方更容易吃醋。

如果夫妻是在登记前发生的性行为，那么结婚以后，双方吃醋的比例就会上升到约58%；可是那些登记后才上床的夫妻里却只有约40%；就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前者比后者要多大约一半。

其中，丈夫对妻子吃醋的情况只增加3个百分点；可是妻子对丈夫吃醋的情况却增加13个百分点之多。这说明，如果有过登记前性行为，那么妻子会比丈夫更加容易吃醋，而且吃醋的激烈程度，也比丈夫要大。

那么，上述的2种情况又说明什么呢？

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可以证明：女性如果发生了登记前性行为，那么她在婚后就会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上，不得不仰视丈夫。因此，一些人可能会更加振振有词地宣称：婚前性行为更不利于女性。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一旦发生登记前性行为，妻子为什么就会仰视丈夫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她虽然敢于做出或者接受了登记前的性行为，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贞操观并没有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消失。无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当时，双方如何自觉自愿，如何激情万丈，她在心底深处仍然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毕竟是“失贞”了；毕竟是不那么“守妇道”；毕竟要比那些

“明媒正娶”的妻子矮一头。结果，她就不得不在婚后努力地“弥补自我”：用多做家务来证明自己仍然是“淑女”；用更加爱丈夫来证明自己仍然“纯情”；用更加吃醋来证明自己决心“从一而终”。总之，她仍然害怕丈夫觉得自己“放荡”，仍然害怕丈夫会因此抛弃自己。

对于这样的女性来说，还有更深刻的恐惧：她对丈夫更加难以信任了。无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当时，双方如何信誓旦旦，妻子仍然害怕自己会把丈夫“教坏了”或者“宠坏了”，使他再到别的女人那里去“牛刀小试”“一展风采”。

所有这一切，是登记前性行为这个事件本身的错，还是传统贞操观的罪恶？是因为那些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女性太开放了，还是因为她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放？

3. 双方更容易打架。

在婚后的5年之内，与那些没有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相比，有过的夫妻发生打架的可能性是前者的4.88倍。从结婚的第一年开始，每年增加47％的可能性。农村夫妻发生打架的可能性，比城市夫妻增加48％。

在我们调查的前一年里，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发生打架的可能性，比没有过的夫妻多出93％。可是，农村夫妻打架的可能性反而比城市夫妻减少35％。结婚时间长短与此没有显著的关系。

打架可以分成3种情况：妻子单方面打丈夫、丈夫单方面打妻子、夫妻双方对打。

在婚后5年内，在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中，首先是双方互相对打的可能性增加得最多，比那些没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增加5.63倍；婚后每年增加32％的可能性；夫妻的年龄每年轻1岁就增加13％的可能性；农村夫妻的可能性比城市多出80％。

其次是丈夫单方面打妻子的可能性，在婚后5年内增加5.0倍；婚后每年增加34％。可是，夫妻的年龄以及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却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调查前的1年里，首先增加的也是双方互相对打的可能性，竟然高达43.8倍之多。但是，看来这只不过是年轻气盛之举，因为随着夫妻的年龄每增加1岁，打架的可能性反而下降36％。此外，婚龄长短、是不是农村人，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实际发生率请看表7－16。

表7－16：有登记前性行为，夫妻打架更多（％）

| | 婚后5年内 | | | | 调查前1年 | | | | |
|--------|-----------|-----------|-----------|-----------|-----------|-----------|-----------|-----------|------------|
| | 打过架 总计 | 只有女 打男 | 只有男 打女 | 双方互 相打 | 打过架 总计 | 只有女 打男 | 只有男 打女 | 双方互 相打 | 其中打 得很重 |
| 登记后才上床 | | | | | | | | | |
| 18.5 | 7.7 | 4.4 | 6.6 | 11.9 | 8.2 | 3.3 | 0.4 | 41.9 | |
| 先上床后登记 | | | | | | | | | |
| 46.6 | 5.5 | 17.0 | 23.9 | 20.6 | 5.7 | 6.6 | 8.3 | 44.8 | |

表7－16里的统计数字，也许会使得反对婚前性行为的人士们理直气壮。但是可惜，这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丈夫，即使真的认为妻子与自己所发生的登记前性行为是因为她“随便”，他还能再像以前的“男子汉大丈夫”那样，想打她就打她吗？恐怕很难了。女性毕竟已经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羔羊。君不见，夫妻对打的可能性与实际发生率都如此之高，说明妻子已经敢于反抗丈夫的暴政，哪怕身单体弱也奋勇上阵；哪怕自己遍体鳞伤也要争这口气。

最雄辩的事实是：在那些没有过登记前性行为却打过架的夫妻里面，在5年内敢于互相对打的只有36.0％；而在那些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之间，出现双方对打的却多达51.2％。

在调查前的1年里，反差就更大的惊人：那些没有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对打的只有3.0％；可是在登记前发生过性行为的夫妻中，却有40.3％是互相对打。也就是说：登记前的性行为实际上给妻子增添了“以暴制暴”的巨大勇气，而且一直坚持到婚后至少5年之久。这应该不应该算作婚前性行为的功劳呢？

当然，如果可以继续分析的话，我们猜测：在这种对打中，“贞操”可能还是多多少少发挥了一些作用。那些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妻子，可能恰恰是因为怀疑丈夫打自己是因为自己“失贞”，才格外愤怒、格外不能容忍的。反之，那些没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妻子，可能把丈夫打自己的原因归结为其他事情，才不那么勇于对打。

对于婚后性爱状况的影响

就结婚之后的性生活状况而言，在控制了年龄大小、婚龄长短、城乡差别之后，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比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要好许多。这反映在如下方面：

1. 亲昵更多。

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丈夫，经常拥抱妻子、吻妻子的可能性，是那些登记后才过性生活的丈夫的2.2倍。

从现实的发生率来看，在有登记前性行为的丈夫里，有80.7%的人至少是有时拥抱妻子怀着吻妻子；可是那些登记后才上床的丈夫却只有66.3%，比前者少14个百分点。尤其是，如果单看经常拥抱或中接吻这一项的话，那么在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丈夫中，经常这样做的人占32.2%；可是在登记后才上床的丈夫中却只有13.3%，比前者少19个百分点。

2. 性生活次数更多。

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性生活频率更高的可能性，要比那些没有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多出76%；城市夫妻比农村夫妻多出67%的可能性；夫妻年龄每年轻1岁就增加9%的可能性。

从实际发生率来看，如果按照百分制来计算的话（频率越高得分越多），那么前者的平均得分高达67.92分；而那些没有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却只有53.17分。这就相当于说，前者性生活的频率平均比后者多出将近15个百分点。

如果再细看下去，那么农村的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得分最低，只有48.65分；而城市里那些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得分最高，达到69.43分。两者相差接近21个百分点。具体数字请看表7—17。

表7—17：男性如有登记前性行为，婚后5年内的性生活频率就更高（%）

| | 上次性生活的时间 | | | | 调查前1年内的性频率 | | | | |
|--------|----------|------|------|------|------------|------|------|------|-----|
| | 一年 | 一月 | 两周 | 一周 | 每月1次 | 每月 | 每周 | 每周 | 每天 |
| | 内 | 内 | 内 | 内 | 或以下 | 2—3次 | 1—2次 | 3—6次 | 都有 |
| 登记后才上床 | 4.4 | 21.1 | 22.2 | 52.2 | 1.1 | 41.1 | 50.0 | 7.8 | — |
| 先上床后登记 | 11.9 | 4.0 | 8.9 | 75.2 | 1.5 | 8.4 | 66.0 | 17.2 | 6.9 |

3. 性兴奋与性高潮更多。

在性生活中是不是感到兴奋，是夫妻性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这方面，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的兴奋可能性，是没有过的夫妻的2.48倍。前者经常兴奋的实际发生率是39.2%，而后者只有33.3%。此外，在后者中还有6.0%的夫妻在性生活中居然完全没有兴奋，而在前者中，这样的人却只有3.2%。

有没有性高潮，是性生活质量好坏的更加直接的表现。

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过的夫妻的2.11倍。同时，妻子获得的可能性仅为丈夫的6%。

从实际发生率来看，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每次性生活里都有性高潮的人占到29.9%，而“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中却只有14.7%。

4. 女性的性高潮增加。

尤其必须指出的是：有过登记前性行为，对于女性获得性高潮有着巨大的帮助。

如果妻子有过，那么她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就是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妻子的2.5倍。细看实际发生率的话，在前者中，每次性生活都能够获得性高潮的妻子达到10.8%；可是在后者中，却只有区区0.6%，期间的反差何其大！反过来，从来没有过性高潮或者很少有过的妻子，在后者中多达14.1%；可是在前者中却只有7.4%。

如果夫妻是在登记前发生的性行为，那么丈夫帮助妻子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也会大增，达到那些“先登记后上床”夫妻的2.3倍。从实际发生率来看，能够帮助妻子获得性高潮的丈夫，在前者中占到93.9%，而在后者中却是87.0%。反之，在后者中，无法使妻子获得性高潮的丈夫占13.0%，而在前者中却只有6.1%。

为什么呢？我们既不必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而欢呼婚前性行为，也不必反过来为了维护道德而无视事实。其中的原因实际上非常简单：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早下水当然就更加可能早学好游泳。

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那些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女性，只不过是一些先行者，而幸福往往属于她们，而不会光顾那些瞻前顾后者。

5. 性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如果夫妻是在登记之前发生的性行为，那么在婚后，他们在性生活中就会比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更加活跃和浪漫。这充分表现为：他们更经常地采用几乎所有的性爱抚方式和性交方式，而且经常采用之的可能性增加了0.6倍到2.2倍。详细情况请看表7—18。

表7—18：有登记前性行为，婚后性生活方式更多

| | 无婚前性行为 | | | 有登记前性行为 | | | 有者是无者的多少倍 |
|------------------|--------|------|------|---------|------|-------|-----------|
| | 从不% | 有时% | 经常% | 从不% | 有时% | 经常% | |
| 在性生活中接吻 | 4.5 | 64.4 | 31.1 | 2.9 | 62.8 | 34.3 | 2.736 |
| 女人抚摸男人乳头 32.1 | 61.5 | 6.4 | 13.7 | 68.7 | 17.5 | 2.547 | |
| 男人抚摸女人乳头 10.9 | 45.5 | 43.6 | 2.3 | 41.7 | 56.0 | 3.210 | |
| 互相抚摸乳头 7.0 | 86.7 | 6.4 | — | 82.5 | 17.5 | 2.275 | |
| 男人抚摸女人外阴 13.2 | 60.9 | 25.9 | 6.6 | 58.9 | 34.5 | 2.162 | |
| 女人抚摸男人外阴 23.6 | 67.4 | 9.0 | 11.8 | 62.6 | 25.6 | 2.364 | |
| 互相抚摸外阴 12.8 | 80.1 | 7.1 | 5.5 | 76.4 | 18.1 | 2.889 | |
| 女上位性交 30.7 | 62.9 | 6.4 | 29.0 | 61.8 | 9.2 | — | 2.436 |
| 后入位性交 | 55.3 | 40.6 | 4.1 | 31.7 | 65.4 | 2.9 | |
| 肛门性交 97.4 | 2.6 | — | 97.1 | 2.9 | — | 1.590 | |
| 男人口交女人 75.7 | 22.8 | 1.5 | 67.1 | 29.7 | 3.2 | 1.798 | |
| 女人口交男人 75.3 | 24.7 | — | 70.1 | 26.4 | 3.4 | 2.170 | |
| 互相口交对方 70.0 | 29.9 | — | 61.4 | 36.1 | 2.6 | 1.920 | |

从上面的表格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在婚后的性生活中，采用各种方式的频率之高，实在是令人惊讶。如果我们在统计一下他们总共采用过多少种性行为方式，那么婚前性行为的促进作用会更加突出。

下面，我们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

首先，男性如果有过登记前的性行为，那么婚后性方式总数更多。他们在3种爱抚中平均采用2.93种，比那些登记后

才上床的丈夫们多出0.3种，而且发生的可能性是后者的3倍。他们在5种体位中平均采用2.28种，比那些登记后才上床的丈夫们多出0.9种，而且发生可能性是后者的4.7倍。

其次，如果女性有过婚礼前的性行为，那么她们婚后采用的性方式的总数就会更多。她们在3种爱抚中平均采用2.92种，比那些登记后才上床的妻子们多0.4种，而且发生可能性是后者的6倍。她们在5种性交体位中平均采用2.46种，比那些登记后才上床的妻子们多0.8种，而且发生可能性是后者的27倍。

上面的两种情况充分说明，有过登记前性行为或者婚礼前性行为，确实促使人们在婚后的性生活里更加五彩缤纷。其中，女性如果有过婚礼前的性行为，那么这种促进作用就会更大，超过了登记前性行为对于男性的促进。

可是，当我们询问“您觉得，性生活中的爱抚是不是已经足够了”的时候，恰恰是这些有过登记前性行为而且性生活已经十分丰富多彩的夫妻们，却有45.5%的人认为仍然不够，只有48.4%的人觉得已经够了。

反过来，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而且性生活相对更单调的夫妻们，却有59.9%的人觉得已经足够了，认为仍然不够的人只有36.3%。也就是说：越是多彩多姿的人们越觉得不够，越是贫乏的人反而觉得足够了。两者之间的可能性相差43%。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不得不猜测：对于“性”的理解和要求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些在登记之前就发生过性行为的夫妻，可能就是一荣俱荣的例证：他们既然能够突破社会在性关系方面的束缚，当然也就不大可能再被一些性行为方面的清规戒律所捆绑。于是，一种自由换来了另一种自由。

反过来，那些在性关系方面循规蹈矩的人，恐怕也不得不在性生活中谨小慎微。这也许就是一损俱损的例子吧。

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是不是有过登记前性行为，对于婚后的日常生活都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您不承认我们上面所统计分析的一切，那么您也仍然没有任何根据反过来说“婚前性行为会危害婚后的幸福”。

婚前性行为的法律地位

婚前性行为为什么会遭到反对与谴责呢？一句话，目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仍然不能承认：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未婚，哪怕是青少年，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国家的义务是保证这种权利得以实现，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不能承认性权利？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主流社会甚至不能承认未婚者和青少年也是人。例如，主流社会总是把教育者比喻为“园丁”，也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修枝剪叶，结果被教育者就不得不变成任人宰割的草木。可是在学生感谢好老师的时候，却往往把他们比喻为“蜡烛”，强调了他们为了学生的发展利益而宁肯牺牲自己。

这种“园丁思想”，从近期来看，来源于“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接班人情结”；从渊源来看，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在作怪。它的深层意义就是力图永远“复制明天”，以确保“江山万代不变”，最终达到“虽死犹生”的效果。这就是中国历代主流社会寻求“永生”的“现世宗教”。因此，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其实是以不许改道为限；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则意味着绝不能变红。

承袭了这种传统的当今主流社会，当然必须压制个人的独立自主的“性权利”，因为它意味着“不服天朝管”；更必须遏止任何在发展中出现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的苗头，因为它是“变质”；只不过这些都被叫做“未成年保护”而已，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打是亲、骂是爱”。正是出于这种基本立场，婚前性行为才一直被视为“违法”。

当今主流社会最大的错误就是顽固地闭眼不看现实。我们上述的统计分析已经表明：恰恰是在那些主流社会的接班人里，婚前性行为不仅已经成为观念的主流，而且已经成为行动的主流。可是主流社会却依然在声色俱厉地反对甚至惩罚婚前性行为。

这种顽固可能带来的后果，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法不责众”的问题了，而是“合法性”的根本问题，是究竟代表谁的问题。

尤其是，社会实践其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只不过主流社会还不敢承认而已。君不见，自从1990年代之初起，《结婚管理条例》就规定“婚前性行为”最多可以罚款3000元。它一直被执行着，也一直被嘲弄着，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有哪一个大城市里的哪一个执法者敢去真的执行它；更别说真的能够执行到底了。到了2002年，情况反而变成：警察抓了在旅馆里同住的未婚男女，却引起全国舆论的哗然；不但抨击者如潮似浪，而且已经没有一个人（包括为自己辩护的警察）想得起还有这样一个法规的存在。

这其实是好事，是人们用“忘记”来投票，否决了当初的荒唐。

[1] 比如在美国，婚前性行为很早就被不同的研究者作为可能的“性革命”的线索（埃瑞克森和斯蒂芬 1999：67-86）。

[2] 这比美国的同龄女性要少得多，简直是天壤之别。在美国，那些出生于1963年到1974年之间的女性，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分别是64%。尤其是她们与男性的比例（65.7%）相差无几，反映出这方面的男女平等。

[3] 斯坦利，1995。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